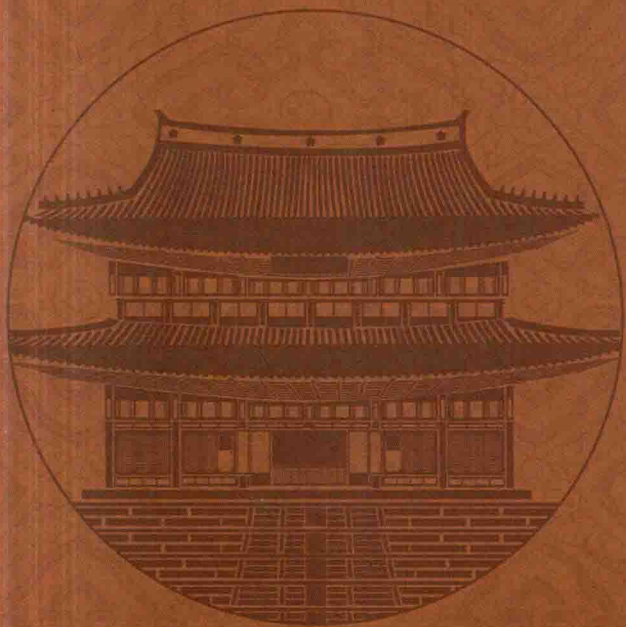


华夏吴姓家族史 (中)

吴清云 编著

一部可供族人研究、发掘、整理吴姓宗族文化、精神文明、
疏通渊源脉络的史料书，有助于激励吴姓族人继承先辈美德，发扬爱国爱民的光荣传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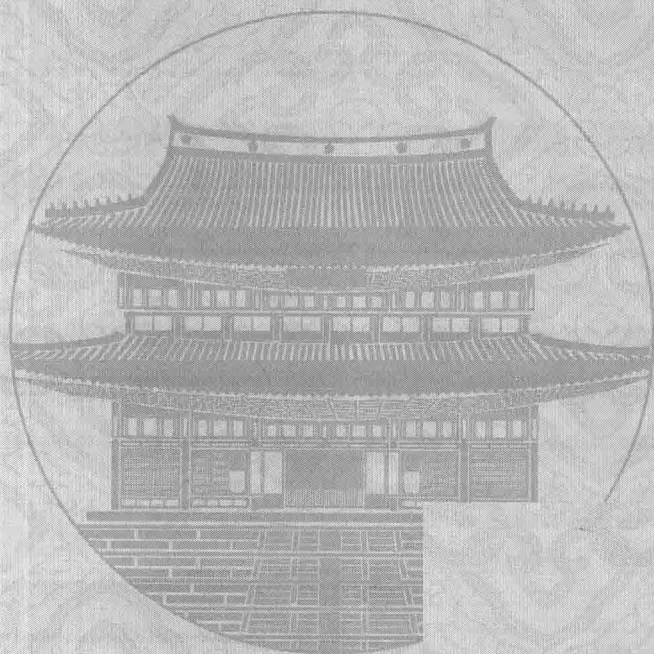
和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华夏吴姓家族史 (中)

吴清云 编著

一部可供族人研究、发掘、整理吴姓宗族文化、精神文明、疏通渊源脉络的史料书，有助于激励吴姓族人继承先辈美德，发扬爱国爱民的光荣传统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“借兵复仇，血战雄关”。吴三桂以图暂保，灭清复明。自李自成进京，君已宾天，父母及家室安危系于心中，陆续派出心腹小校潜入京城暗中探听虚实。当关中事务交割之后，家讯未知，故仅带数千精兵进京，所过秋毫无犯。四月初至永平，四月四日至玉田（一说永平西沙河驿），迎面碰上了暗探亲校，得知父亲被拘逮拷掠，妾室被强掳侮辱的消息。吴三桂大吃一惊，即令部下就地扎营，同时召集心腹将领告知此事，众多半信半疑。吴襄在受刑交金之后，连夜派心腹小校傅海山设法混出北京，四月五日至玉田告之京情。同日又遇见家中苍头（仆人）与一姬连骑东来，跪对三桂曰：“老将军被收矣，一门皆为卤（掳掠），独与姬得脱，东归报将军。将军其速为计。”三桂听了三路消息异口同声，证明事情属实。他意识到：“闯贼表面上对我招抚，实际上却要把我诱引进京，一网打尽，斩尽杀绝。我吴三桂堂堂的大丈夫，既不能保国，又不能保全身家，有何面目见人！”悔恨交加，气愤填膺。

吴三桂出身行伍，是在同金（清）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骁将。其年岁正经，血气刚烈，在君死国亡，家产被抄，父母亲属蒙难，其父遭毒刑拷打，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，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！更不会自投罗网，束手就擒。他本就忠于明室，又是对父母至孝之子，迫于形势，“我为老父故，无奈为之。”而今“老父刑之将死”，国仇家恨，怒火冲冠，再也按捺不住对李自成的仇恨，对部下说：“我不忠不孝，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！”仰立向天，拔刀自刎。部将们寻急制止，说：“将军何至此？吾辈当死战！”于是，他与众将官发誓“讨贼”，与李自成血战到底。当日下午翻然复回山海关，剿灭唐通，杀得唐通仅带八骑夺路逃还北京。吴三桂夺关后，决心征讨李自成。他陈兵演武场，举行阅兵誓师，激励将士的战斗意志。并令全军壮士为崇祯服丧，设座遥奠，啮血结盟，坚决扫灭闯贼为君父报仇，为国家雪耻。此时，其兵力拥有五万众，一股敢战勇斗的气势充满全军上下。当地士绅乡民欢迎“饷以牛酒”慰劳吴军。当时李自成派来的巡抚、兵备道李、陈二人还在营中，他立斩李的首级祭旗，割下陈的两耳放出传话：“令李自成自送头来。”唐通奔至九门，急派人进京告知。李自成闻之大惊，急令放吴襄出狱，并“厚加抚慰”；又令刘宗敏将陈圆圆送回吴襄家，派人看护（软禁）；再令牛金星伪书一道，强迫吴襄抄写，再劝其降；唐通又书一封，遣兵部尚书王则尧带上饷银数万往关。事已晚矣，吴三桂复仇意决不答，并上书于父。其文曰：“儿以父荫，熟闻义训，得待罪戎行，日夜励志，冀得一当以酬圣眷。属军事万急，宁远巨镇为国门户，沦陷几尽，桂方力图恢复，以为李盗猖獗，不久便将扑灭，恐往复道路，两失事机，故暂羁时日。不意我国无人，望风而靡。吾父督理御营，势非小弱，巍巍万雉，何至（一、二日内便已）失坠？使桂捲甲赴阙，事已后期，悲恨何极！侧闻圣主宴驾，臣民戮辱，不胜毗裂！犹忆吾父素负忠义，大势虽去，犹当奋椎一击，势不俱生，不则刎颈阙下，以殉国难。桂亦缟素号恸，寝于后怨（仗甲复仇）；不济则以死继之，岂非忠孝媲美乎！何乃隐忍偷生，训已非义。既无孝宽御寇之功，复愧平原骂贼之勇。夫元直荏苒，为母罪人；（王）

陵(赵)苞二公,并著英烈。我父嘯哨宿将,矫矫王臣,反愧巾幗女子。父既不能为忠臣,儿亦安能为孝子乎?桂与父诀,请自今日。父不早图,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,三桂不顾也。”

这封信明对父亲,实指李、刘、牛,其态度是与大顺决战,义无反顾,与父诀,也是向李自成宣战。激昂心声悲壮慷慨,气冲霄汉。同时散发檄文:“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:为复大仇,歼大寇,以奠神京,以安黎庶事。切痛先皇被弑,亘古奇殃;剧寇披昌,往代未有,凡属臣僚士庶,能不碎首殒心!今义兵不日来京,尔绅衿百姓,须各穿缟素,协力会剿,所过地方,俱接应粮草,务期罄捣巢穴,纤介无遗。庶使克复神京,奠安宗社,乾坤再整,日月重光,特示。”

告示已明示原则立场,此际自己处于孤立,腹背受敌,西有李自成威逼,关外之东有清军压境。1644年4月13日,李自成率刘宗敏、李过、宋献策等将领,号称统兵20万,挟吴襄及明太子朱慈烺、永王、定王,正式出师,直指山海关进发;当李自成忙于筹备登基大典、搜刮钱财不断升级之时,沈阳的清军由多尔袞等将帅率领精兵14万,向南进发,4月11日至辽河,13日渡过辽河,进至河西120里地宿营。此时,因对山海关情况不明,决定绕关从蓟、密进京。15日清军已至翁后(辽宁省阜新县附近),16日至西拉塔拉,19日午至锦州。可以说老冤家、新仇人一齐压来,山海关的形势已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。面对敌众我寡,以一对七的严峻现实,吴三桂“传檄远近”,已把“克复神京”之责全部承担为己任,不得不忧虑双方的力量对比,战争胜败。他几次与诸将军讨论对策,谋士方献廷等进言:“莫若请北兵(即清兵)进关,共歼‘李贼’,事成则重酬之。”即“向清借兵,割地以酬。”吴三桂反复权衡利弊。他认为:清、顺有根本利益的矛盾。清曾对他有过招抚之意,亲朋好友甚多;自处地位的倾斜,对清、顺都至关重要。李自成方已宣战讨之,无“和”之路;清虽老冤家,此战对清系着切身利益。如此,只有冒险一试,“借兵灭寇”。于是方献廷起草了一封向清朝摄政王多尔袞请兵的信,其文如下。

明平西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,谨上书于大清国摄政王殿下:

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,以蚊负之身,荷辽东总兵重任。王之威望,素所深慕,但春秋之义,交不越境,是以未敢通名,



山海关护城河。山海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它拱卫京师,明清两朝都派重兵把守。

人臣之谊，谅王亦知之。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，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，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。不意流寇逆天犯阙，以彼狗偷马合之众，何能成事！但京城人心不固，奸党开门纳款，先帝不幸，九庙灰烬，今贼首僭称尊号，掳掠妇女财帛，罪恶已极，诚赤眉、绿林、黄巢、（安）禄山之流，天人共愤，众志已离，其败可立而待也。我国积德累仁，讴思未泯，各省宗室，如晋文公、汉光武之中兴者，容或有之；远近已起义兵，羽檄交驰，山左江北，密如星布。三桂受国厚恩，悯斯民之罹难，拒守边门，欲兴师问罪，以慰人心。奈京东地小，兵力未集，特泣血求助。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，今无故而遭国难，北朝应惻然念之，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。夫锄暴翦恶，大顺也。拯颠扶危，大义也。出民水火，大仁也。兴灭继绝，大名也。取威定霸，大功也。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，不可胜数，义兵一至，皆为王有，此又大利也。王以盖世英雄，值此摧枯拉朽之会，诚难再得之时也。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，速选精兵，直入中协、西协，三桂自率所部，合兵以抵都门，灭流寇于宫廷，示大义于中国，则我朝之报北朝者，岂惟财帛？将裂地以酬，不敢食言。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，但未悉北朝之礼，不敢轻渎圣聪，乞王转奏。

此书拟定，特遣副将杨坤、郭云龙为使臣，离关去沈阳请兵。二人星夜疾驰，在4月15日至翁后，正遇南下清军，面见多尔袞；16日多尔袞虽应请借兵，而信中仍有劝降之意，同时存在戒备之心，扣杨坤为质，并派妻弟拜然与郭云龙至山海关以探虚实。其行军路线亦不按吴三桂所书中西协，而直向山海关。4月19日，李自成军先锋已至永平（今河北卢龙），与吴军守军发生激战，吴军败退。此时吴三桂又派郭云龙、孙文焕及清拜然至请军，“贼兵已迫，朝夕且危，请如约促兵以救。”同时又派高选等6人为他的代表前去李部以诈降为“缓兵之计”，至三河（河北三河县）相遇李军。这样李自成虽不全信但还抱有希望，故行军未止而减其速。清军从4月17日起，行速稍有加快，19日起始疾行。其间，吴三桂抓紧备战，在关西的石河一带设阵，同时又征乡勇3万余人。士绅们也组织武装（有许多生员也参战），并助饷银7850余两，稽查战马120多匹，支持吴军。当李自成于4月21日到达山海关时，迎接他的却是在石河边已摆开决战阵势的辽兵，而清军也到达山海关外15里之地。一场山海关血战（或甲申石河大战）正式拉开序幕。

1644年4月21日，战斗从石河西开始展开。一场恶战从早晨杀到中午直至下午，处在劣势的吴军曾几度危机，又几度转危为安，其战斗力顽强。当日晚，三桂恐兵士疲乏，无奈冲开敌阵，撤回关城。李军不敢进逼。以东、西、北三面包围山海关，双方炮火不止。吴三桂料定次日战斗更残酷，必有恶战。于是他遣使往返8次请兵，下半夜清军才开始移进，黎明时才进入离关5里地的欢喜岭，但仍止不进。三桂又派余



一元等5人代表民意前去敦请。4月22日,李军已向北翼城展开了攻击,守将拼死抵抗。眼见李势很猛,又有清使范文程(原明臣)示意多尔衮要面见三桂(实为诱降)。硬汉子吴三桂率亲兵200名,在炮火掩护下杀出关东门,一口气驰上威远城,“请大军共诛李贼。”可是多尔衮还示意祖大寿、洪承畴等劝降,三桂不从,说:“我现在腹背受敌,如果王爷能按我的计谋,并力攻击闯贼,将来得了北京,一定则归大清;如果不听我的计谋,万一我的部下被逼无奈,投向了闯贼,恐怕对大清就不利了。”范文程见势不妙,赶忙周旋,转到具体条件上来。据《谰闻续笔》卷一记载:“桂念腹背受敌,势不得全,乃与清帅约云:‘从吾言,并力击贼,吾取北京归汝;不从吾言,等死耳,请决一战’。(多尔衮)问所欲?桂曰:‘毋伤百姓,毋犯陵寝,访东宫及二王所在,立之南京,黄河为界,通南北好’。清帅许之,携刀说誓,而以兵若干,助桂击贼”。多尔衮还想逼降,时人告急,北翼城部分明军哗变投了大顺,城亦将破。这才同意盟誓,以白布系肩为记号,以示区别友敌。三桂急回。清兵分三路,从北、南、中门入约6万人,余者仍住欢喜岭。三桂按约先率5万骑出战,直奔石河西面。李见吴军倾巢而出,急行围困。三桂军飞驰过河,顿起大风,飞沙走石,尘土蔽空,刮得天昏地暗,只见:吴军的呐喊声,伴着狂风的怒吼,不顾一切地直冲李军右翼(即阵首;靠近北山一侧)的后部。吴三桂见到李军分外勇猛,鼓噪全军奋击。三桂跃马横刀,大将吴国贵提刀跃马,身先撞阵,士卒们个个奋勇,以一当百,在阵中左挑右砍。李军前死后继,并以优势兵力对吴军实行三面包围。吴军拼力反击,东西驰突,“阵数十交,围开复合”,反复无数,酣战半日,双方伤亡都非常惨重,“石河的水都被血染红了。”值双方精疲之时,多尔衮才传令出兵。吴军见清兵已出,顿时精神抖擞倍增,越战越猛,敌大将刘宗敏迎战,连中两矢,栽下马来,其亲兵拼救才冲出重围,向西溃退。主将中伤,士卒四下败逃。吴军穷追不舍,李自成仓皇向永平方向逃走。石河大战结束:贼死数万人,大帅15人,吴军死伤也不少,双方留下的尸体已“弥满大野,沟水尽赤”。据余一元记:“凡杀数万人,暴骨盈野,三年收之未尽也”。

(二) 追剿李自成 受封平西王

山海关血战,李自成败逃,吴军紧追不舍。李自成收集残兵败将为缓解追击赢得撤退时间,边阻击,边派降臣张若麒至三桂军中议和,其条件是:“李自成必须归还崇祯的太子和两王;速离京师,奉太子即位而后罢兵。”李自成表示同意。吴三桂即停止追击,但是多尔衮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农民军,夺取全国政权。吴三桂回关后,多尔衮不同意交换太子的条件,要加速追击李军,直取北京。吴三桂因急于灭寇,早日进京,也就作罢。

1644年4月23日,离关直追,以三桂为先锋,追至永平城西20里地的范家店兵至城下,“李自成以二壮士挟吴襄,乘堙呼三桂谕降。吴军见之,抽矢射挟者,皆反坠。李立斩吴襄,将头悬竿于城上。三桂披发坠鞍踏地哭,三军咸愤怒,拔刀斫地誓杀贼”。4月26日,李自成退回北京;4月28日,三桂至京畿。李自成命刘宗敏、李过、李岩拒战,唐通为前锋,合各军联营18座,阻击三桂入城。可吴三桂当先踰营,无人可挡,不到半日,已破8寨,余4寨亦绕城遁走,敌伤亡2万余人;唐通被刺落马,刘宗敏等败逃入城。李自成遂杀三桂全家38口。三桂闻之,“面如土色,捶胸恸哭”。4月29日,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内匆匆登基称帝。接着强令百姓出城,夜半,下令放火,明室宫殿,九门城楼,尽行烧毁。30日凌晨,李带囚太子及二王,出齐化门,令降将左光先、谷大成率万骑殿后,刘宗敏“拥锦衾卧长几”,向西逃跑。吴三桂见城中火起,料敌屡败必西逃,便设疑兵西山,取酒罍数千,装上石灰夜埋齐化门道上,每数尺置两罍,上覆浮土。敌万马奔驰,罍穿,陷马足,惊蹶,后骑相压奔,踏尘涨天,石灰迷目不得视,疑兵远噪惊之,李阵大乱,“勒兵遂绕城而西……,追奔三十里及之”。5月1日,吴三桂追至通州,过卢沟桥,向西追贼;2日至保定,战之胜;3日庚寅至定州(河北定县)北十里清水铺,李将谷大成,麾兵迎战,“贼饥疲,一战而乱”,三桂长驱奋击,李兵溃,斩谷大成,擒守御三人,杀敌数千,夺回妇女2000……,缴获金银砖700余,器械马匹无数。三桂屯定州,其士民,遂斩伪州牧董牧,函首迎三桂。三桂为父设灵位,取谷首级祭祀,泣血尽哀。“尽以輜重散三军,招降李兵溃散者,得万余人”。4日,李部败真定(河北正定),“贼既屡败,士卒逃窜甚众,伪将相牛金星、李岩亦心怀二三。自成自济河而东也。雄边劲镇无不摧灭,长驱数千里,未尝小衄;三桂乃数胜之,子女玉帛多为所夺。自成深愤之,亲勒精骑还击三桂兵。”三桂兵张两翼以进,东西掩击,杀李将三人,斩首万余。李败回真定。5日,李调集兵马,督率诸将,与三桂要决一死战,“不求人助,亲次死斗。”三桂兵接战,“自晨及晡,兵数交,互有杀伤”。忽然:“东风大作,黄沙蔽天日”,李阵,“屡开屡合,旗偃复立,马蹶复起,殊死斗”。三桂指挥关兵分兵轮番休战。李知不可胜,下令收兵撤退。当他正要回营,关兵射李自成坠马,肋下中矢(一说中肩),掖之骑驰还营。6日,李拔营西走,度固关入山西。先屯山西平阳,布置兵力,以堵关兵入西。7日,三桂抵固关,由于屡征屡战,军队急需修整,又临险关,于是决定12日回兵京师。

1644年10月1日(农历),清从沈阳迁都北京,顺治帝8岁举行定鼎登基大典。此时吴三桂在无所依恃的情况下,便剃发称臣,是明臣明将中最后一个降清的。据《山海关大战》一书记载,10月13日,顺治帝封吴三桂为“平西王”,为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四王之首,特赐平西王册印,白金万两,鞍马一匹,无鞍马二匹。

自1644年始,迄今360多年,对吴三桂的归清,众说纷纭,李郁在《吴三桂演义·校

点后记》云：“事实是，当明亡存于千钧一发，三桂奉命尚在宁远镇守，崇祯帝却犹豫不决，坐失良机，直到农民军已破居庸关，始下决心调吴军进京勤王。惜乎，为时已晚！吴军刚过山海关，北京已破，崇祯帝自缢。三桂救明不及，非三桂之罪，实由崇祯帝误国。吴军不过三万余，难与雄据北京的农民军五十余万众相匹敌。他回天无力，不会自取灭亡，回师山海关，以图自保。说三桂‘袖手视国家丧亡’，乃不实之词。”许多史料纪实：1644年，自正月十九日始，崇祯帝就提出调吴三桂进关，但又不愿承担“弃地”之责，而推诿给诸大臣。且大臣们又高调巧妙地把责任再推给崇祯。吏科都给事中“吴麟徵，‘清弃关外宁远，前屯二城，徙吴三桂入关，屯宿近郊，以卫京师。三桂忠勇，可倚以办贼’。廷臣以弃地非策，不敢主其议。”延误20多天后，二月八日农民军已克太原，“京师为之震动”，兵部尚书张缙彦说：“三桂之调不调，视宁远之弃不弃，两言而决耳。”崇祯对王永吉、杨鹗二人关于“宜撤宁远，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”的奏疏，虽出示给阁臣陈演、魏藻德等，而因陈、魏而推之“征求各抚镇之议而后定”，不得结果。在德政殿崇祯召集科道九卿议撤宁远事，除大学士范景文、倪元路、朱元俊等少数几人支持王永吉之义，尤以吴麟征最为坚决，他说：“宁远当徙与否，该抚镇当于皇上密议之，而辅枢二臣与皇上密议之，委之盈庭，谁执其咎？然臣请任少咎矣。嗟乎，自有封疆之难，死法列敌者比比，而朝廷曾不之惜，则夫裹革沙场，横尸西市者，皆赍志而未瞑目者也。宁远一镇一抚，皆当今人杰，臣有三思，不觉汗泪俱下。”阁部议久不决，他又进而阐明宜撤宁远的必要性：“宁远孤城，其势必弃。今日弃之为弃地，明日弃之为弃人。弃地已不可，弃地兼弃人更不可。吴三桂勇将宜收用，（不可）委之敌人。今寇旦夕至，若使来捍京师，一举两得。”他要求六科共同署名，但他们相互推诿。吴麟征气愤至极，则独自署名，将奏疏呈崇祯。但崇祯帝扣压此疏，不批示，不下发。接着麟征又补呈一疏，仍未准奏。拖了月余，直至三月六日，农民军已克京之门户居庸关，崇祯才“下吴麟征请徙宁远疏，飞檄趣吴三桂入关。三桂徙宁远五十万众，日行数十里，是日（三月十六日）始及关，贼骑已过昌平矣。”吴三桂入关安置好宁远百姓后启程，二十日抵丰润，而北京已在头一天即三月十九日为农民军占领，崇祯帝自缢，明朝276年历史告以终结。

人是有血有肉，富有感情的人，国亡家破，父亲遭难，对吴三桂已是重大打击，投李也是情不得已，心非所愿，骤然得知刘宗敏劫夺所爱，感情上受到更猛烈的伤害，深感蒙受耻辱，不仅“忠孝两失”，而且“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，有何面目立于世上！”国仇、家恨、妾耻，激成暴怒，使其加速催化、激愤复仇的决心。那么李、刘为逮捕拷掠一个吴襄，强占一个女人，最终把吴三桂推向清朝一边，而失大顺天下，又能怪谁？

吴三桂是忠守信诺的军人，既已称臣，就得奉命，1644年10月19日，与尚可喜

随阿济格（实为监臣）奉命出征陕西，追剿李自成，次年三月追入河南，李自成拔营南下，奔逃湖北抵襄阳，进武昌，三桂追至武昌，实行包围。刘宗敏、田见秀携 5000 骑出战以败告终。李弃城向东撤退，四月初追至兴国州（湖北阳新县）附近的富池口，与李交鋒，李败奔江西九江，距 40 里处安营，正好三桂兵至展开大战。三桂军猛破老营，彻底击垮李部，全军覆灭，其大批将领被俘降，报称：“大败贼兵八次，兵尽力穷，窜于九宫山……”

此次剿李，收获甚著，湖广、河南、江西、南京等属城共 63 处归清，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下，宋献策、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左光先等，刘斩之，余者皆降。

自 1644 年 10 月归清的吴三桂，从东北一直打到云南边陲，驰骋中国南北大地，与李自成、张献忠及其旧部，明、寇混合部战斗了 15 个春秋，其功盖世，无与伦比。于 1659 年 2 月 23 日回昆明，顺治帝在北京决定他镇云南（尚广东耿广西后福建）。另调张勇、杨明愚、南一魁、马宁、张国柱、沈应时、刘应志、马鹞子、王永祚等 9 人同吴共守云南。10 月 22 日，顺治帝又下达旨令授三桂全权治理云南。11 月 1 日，帝批了吏、兵二部的决定，将云南人事权、民政、军事、钱粮及一切事务含对地方兴利革弊，实施各项措施等所有权利皆授给三桂掌管。由他直接请示世祖批准，地方官员总督、巡抚无权干预，并将文武官员的任免权也给了他，“集军民财政文大权于一身。”多尼、赵布泰、洪承畴均调走。三桂敬重洪承畴，临走时间以“自固之策”，洪神秘而坚定地说：“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”。

时三桂在云南有兵 7 万，另有满州八旗兵，总共达 13 万人左右，而每年的军费开支需银 900 余万两。且顺治十六、十七两年征收的课银共才 538 万多两，仅此还不够云南一年的支付。故引起朝廷决定裁军，由 13 万降至 5 万人。吴三桂以“边疆未宁，兵力难减，宜如旧时”，又以勒永历为由，“三患、三难、三无”之奏疏，朝廷允准。由此，吴三桂一边发展生产，增加课收；一边平定云南局势，日益强固。顺治帝于 1661 年正月初七去世，其三子玄烨 8 岁即位改号康熙。在进京祭典完毕回云南，执行世祖剿灭永历的命令。12 月初 2 擒永历，10 日离缅回师。1662 年 3 月 13 日至昆明。在讨伐永历时清有爱星阿始终随征。1662 年即康熙元年 4 月下旬，下令就地处决永历的命令，4 月 25 日处死于篦子坡，其妻、子在解京途中自杀。5 月吴三桂晋封为亲王，6 月 31 日颁发金册。12 月将贵州交给三桂全权管理，与云南同例。在封册中定：“俾荣及前人，福流后嗣”。

（三）康熙逼撤藩 三桂建大周

既是清朝的开国元勋，又为清朝的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因功封藩。吴三桂留镇云南，为了以藩自固，世守藩地，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实施全面治理。首先从军队着手建设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 年）十月批准，并以朝廷名义正式下达任命的“援剿四镇”统帅，云

南前镇、左镇、右镇、后镇总兵官由马宁、沈应时、王辅臣、杨武充任，分驻武定(左)、曲靖(右)、楚雄(前)、洱海卫(后)四个重要府区。总兵官下设中、左、右游击、守备各3名，千总6名，把总12名，骑兵600名，步兵1500名，守兵900名，计3000，四镇计12000。同一天世祖又批准了一批充任云南各地区的军事长官：张勇、张国柱、阎镇、王永祚、狄三品、刘文进分别为各地区总兵官；重新改编降卒，议“忠勇”“义勇”二营，每营6000，共12000，各营有总兵官、游击、守备千总、把总；另有直属即“藩下”，由三桂直接指挥的53佐领甲兵，由左右两都统管辖，皆为亲信心腹如吴应期(侄)、夏国相(婿)、杨坤、吴国贵(心腹)掌握正统军，控制云贵。后又有“西选”之权，可从全国调入调出，同时地方科举亦是选才的途径。在练兵时，以《黄石素书》《武侯阵法》为教材，以提高素质，备将帅之选。同时令养子陕西总兵王屏藩、王辅臣等，从西藏选取征战强健之马，每年3000匹运往云南，以提高骑术之用。



努力发展经济，以固根基。在封建专制时代“相互倾轧”“弱肉强食”自古存之。吴三桂在云南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，无处不凋残，百姓生活尤为困苦，虽府库不少，却无财帛存储。吴三桂采取了许多措施：动员民众开垦荒地，遇有困难，给予具体帮助。如平定永西(贵州黔西)后，内地百姓恢复生产无费，吴三桂请命朝廷准予发放军中饷银3万余两，买耕牛、种子散发于民，还发军前用米15000石，赈济贫民。整顿财政，扩大财源。云南“地产五金”。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铅，各有矿厂，归厂主独吞，他采取垄断开采之法，扩大税额，还用铜、铅铸钱，在蒙自设炉，制金钱币，专发售给交趾(越南)，换取银两。在蒙自以南二百里的交江蛮耗，设关口，至水路二百里的坝灞，设市卖钱，买卖兴隆。控制盐井税收，扩大经商、典当、放贷等行业。开拓贸易途径，发展贸易事业，如经朝廷批准，与西藏互市贸易，在商业、手工业、采矿、关税、盐铁、金银、土地等皆以贸易之。又经朝廷批准，允许西藏在云南北部互市茶马，并借此广泛招来商人，从事各种贸易活动，活跃当地经济，于百姓有利。如此，财源广收，“财用富饶，兵革坚利”，真谓“富可敌国”。他增修王府，建书屋，名“万卷楼”，收藏古今典籍“无一不备”。

吴三桂尊重人才，知人善任，世称“轻财好士”，凡是对自己有恩之辈的后人都视为兄弟姐妹，如原明大将傅从龙的儿子傅汝如亲同手足；宁都曾应麟有恩于他，而将曾的儿子孝廉传灿请到云南漫游，待之如宾，走时以重金相赠。自云贵以下督抚至守令等地方官员一一皆善，云南巡抚调走赠银相送，新任巡抚病了自带茶水和午饭去看视。湖广会元曹石霞至云南省亲，以银相赠。对待自己的部下更加亲厚(一贯之作风)谦和，人称“与人计事，相对如家人父子”。就是提出诘难，亦“娓娓不倦”。平生“从不盛怒，疾言遽色”。由于他对人“恭敬，虚怀延纳”“将士乐为之用，民心亦翕然对归，强藩雄镇感受其笼络，无不尊附”。凡黔中水西，云南城东、乌撒、蒙古等叛乱、入侵皆平之。

吴三桂“长期经营云贵，世代以云贵为家，”把云贵作为他及其子孙的世守薄地，效明朝黔国公沐氏，与清朝相始终。洪承畴就曾引明沐之例，向朝廷建议：“命三桂世守云贵。”这样做，符合吴三桂的愿望。把云贵给他：一是符合清朝入关时“裂土封赏”的条件，二是基本上与其三桂对清朝建国，统一全国所付出的代价大体相当（他失去亲人38口，失去辽东和京师一席之地），三是基本满足了他的利益要求。他唯一期待的仅此一求。所以他苦心经营云贵，以图自固。他深悉历史，“高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”的悲剧，屡见不鲜。历代许多王朝，在取得政权后往往大肆屠戮功臣宿将。只要稍为清醒的人对那些历史悲剧，不能不心有余悸。那末，吴三桂因此极力握住兵权，掌军队，牢以固守，以免被人任意宰割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
吴三桂经略云贵的苦心可以理解，但是任意加大征税额度，增加民众负担；强行征用民地建牧场；扩建住宅建金殿，劳民伤财；放贷获利，生活腐化，享乐无度等，虽当时屡见不鲜，亦有粉饰释疑之意，但终不可取，既本自不可为之，更不能对下纵欲无度，应取居仁由义，取信于民才是立安去危之道。

“削权夺职，进退维谷”。吴三桂对朝廷的疑虑并非多余。时人云：“满人当权，汉人遭殃”。历朝以来“大汉族主义者”，把满族推出中华民族之外，以致造成民族之间的内战不休，直至孙文闹革命还有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口号，这显然不妥。但是清朝“以满压汉”“以汉制汉、排汉抑汉”的政策激发民族矛盾更为前所未有，制造了一系列打击汉人的恶性事件，如江南“通海案”“奏销案”“明史案”“文字狱”等，吴三桂早就洞察得清清楚楚。对多尔衮及四大辅臣所玩弄的权术他亦预感危机四伏，什么“亲王”爵号，冠冕堂皇，其实包藏祸心。吴三桂早有警觉，虽步步退让，朝廷亦步步紧逼。表面封赏、抚慰，实际上却不动声色的有步骤的逐步削弱吴三桂的实力。四大辅臣鳌拜将他的重要将领调出云南，如赵廷臣、张勇、王辅臣、马宁、李本深、吴得功、严自明、李进忠、王进功等；两营将官改换驻地或调离（在康熙四、五、六、八年反复更换），尤其是在康熙五年二月进一步削弱“两营”，裁去“忠勇”中营归开化镇统辖；直接裁减军队。而且对吴三桂的防范日益明显，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夺了吴三桂的事务、人事权。三桂眼看朝廷一意收权削势，干脆将选任武官之权也上交，朝廷照准，一并收回。这就等于把吴三桂的军政大权尽于剥夺。其“排汉夺勋”，昭然若揭。吴三桂无事就只有比武射箭，朝廷还专派侍卫吴丹前往监察。三桂当然是有心计的，将精锐隐之，选带一些老兵上场比射，请吴丹检阅。吴丹检阅后回京复命，朝廷疑心稍减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，吴三桂60大寿，吴应熊及其妻子、世璠回云南祝寿。三桂很高兴，密对方光深等人说：“上不疑我，诸位谨慎”。可是朝廷对“三王把藩，势力之大”，始终以隐患必除之，“高度警惕，密切注视”，采取“先稳后撤”从

根本上“排汉杜患”，是康熙三大誓愿之首，亦是必然的“夙夜虔念，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”“以三藩之势，不可不撤，撤而后灭”，只是时机。一场“弓藏狗烹”的惨剧，自康熙1667年7月亲政时起开始导演登场。

康熙对吴三桂采取五步攻势：一是笼络三桂部属，封官授职，以示“皇恩”；二是实行人事变动，釜底抽薪；三是收回军政大权，成为闲王；四是裁减军队，削弱实力；五是撤藩拔根，先撤后灭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五月三日，彻底罢除尚藩。京师吴应熊知悉急告其父，要父亲也效法尚、耿，然后从中谋划，保留云藩。吴三桂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，撤吧，一心世守云南的愿望，所得的一切，将全部付之东流；不撤吧，朝廷早就对他不放心，其疑忌重于尚、耿，且必然加深。使他陷于深深的矛盾之中，徘徊不定，顾虑重重，“棋错一著，后果难料”。于是与一班亲信反复商讨，有主张不可上呈辞疏；亦有主张先提申请，试探上方意图，再作打算。吴三桂决定以“请书”察势，由幕僚刘玄初起草《辞职疏》。玄初持“不可上疏”之意，而三桂仍以为上“不敢撤”，上书只是消除怀疑。七月三日上书“自请撤藩”，书文是：“臣驻镇滇省，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（指从汉中迁滇），至康熙三年迁完。虽家口到滇九载，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，念臣世受天恩，捐糜难报，惟期尽瘁蕃篱，安敢遽请息肩！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，已蒙恩鉴，准撤全藩。仰恃鸿慈，冒干天听，请撤安插。”此疏有三义：一是从汉中迁滇三年迁完，刚住九载又要逼迁；二是“惟期尽瘁蕃篱，安敢遽请息肩”，意在死而后已，何须撤藩；三是因闻尚奏撤藩，是形势所逼，并非自觉自愿。疏一到京，康熙以“请撤安插，恭谨可嘉”并七月九日耿精忠撤疏，批准吴、耿同撤，其具体搬迁、安插事宜“著议政王大臣，会同户、兵二部，确议具奏。”朝廷大臣对耿藩裁撤及其具体事宜意见一致。但对吴三桂撤却有两派根本不同的意见：户部尚书米思翰、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撤，兵部尚书明珠赞成，将三桂及官兵、家口迁关外“酌量安插”，派满州八旗兵前往云南戍守；内弘文院大学士图海、索额图等多数廷臣不同意撤吴藩，他们认为：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，地方安定，总无“乱萌”，如吴迁移，不得不遣重兵镇守。兵丁往返，平西王属下迁移，沿途地方百姓，驿站兵丁苦累，而且戍守云南之兵，都要暂时派遣，骚扰地方，亦未可定。应令吴三桂继续镇守云南。

由于主撤和主留之议，康熙又指令议政王大臣同户、兵二部及九卿科道诸臣再议上奏。结果还是两种意见，只得上奏康熙自裁。康熙“誓愿悬柱”，见有奏疏，机不可失，故于多数廷臣意见而不顾，将蓄谋已久而独断一个“撤”！虽然决定全撤，但在朝中存在严重的分歧和忧虑，康熙却毫无根据的疑滇，并戴上诬陷的帽子，坚持说：“三桂等蓄谋久，不早除之，将养痍成患。今日撤亦反，不撤亦反，不若先发。”以“三藩必反”论一压反对撤藩的廷臣，二为撤藩制造依据。“必反论”，把吴三桂等推向敌方，要先下手为强，



先撤后除之，决不是一般的调离撤藩，所以“疏亦撤，不疏亦除。”才是康熙“夙夜靡念”，除灭汉藩的本意。

撤藩令一下，吴三桂顿时愕然，不知所措，悔恨交加，何去何从？抗令，又要落个叛逆的罪名，他打心窝里一万个不愿意放弃数十年以鲜血挣得的荣誉；从命，他将失去一切，苦心为子孙准备的一切。再一次面临着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重大选择。而此次比山海关更复杂，更困难。他深知朝廷撤藩只是一种手段，而目的是要剪灭除之。但他又不甘心情愿地任人宰割，忍受屈辱，于部众、家口而不顾。左思右想，心潮起伏，难以控制。他是一个刚直不阿的汉子，他受了清廷的欺骗，撕毁盟誓和承诺，以至致他于死地，谁又不震动？已得的东西全被夺去，谁又心甘情愿！所以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在鼓励他，在催化他，激发他抗拒的勇气和力量。自扞其鼻，寻求自保之策。朝廷背信弃义的“撤藩”决定，吴三桂属下每个人心中起初震惊，逐而深为愤怒，以鸣不平，“王功高，今又夺滇”！许多将领早已把命运和“平西王”连在一起，“一荣皆荣，一损皆损。”尤以吴三枚、吴应期、吴国贵、夏国相、郭壮图、卫朴、胡国柱、方光深、李本深、刘茂遐、马保、张国柱等一大批亲信将领，因撤藩而激发了他们的反清情绪，同时也渗透、影响着吴三桂；更甚者是民怨极广；广大吏民深感不安；一部分辽东人跟吴已30多年流徙，病、战、伤亡者无数，幸存者年迈，初离辽东时的孩子现已成年，对故土感情不深，现刚适应南方生活；一部分黄河以北的人，山、陕、河南、河北，对辽东无故土之念；一部分是云贵川人，他们对辽东塞寒冷本就畏怯，“犯罪充边”，被贬谪戍之地，更是不愿迁辽东。而且迁了三年才至云南，住了9或12年，刚建家园以作安家立命之所，这对于长期转战，四处为家，受尽艰辛劳苦，刚把生活安定下来，又要迁徙，藩下数十万家口无不愁苦！不是什么“皇恩浩荡”，而是一场空前的“灾难浩劫”。

“清廷背盟，藩王举兵”。吴三桂向清请兵与多尔袞盟约，《谰闻续笔》卷一记载其事：

桂念腹背受敌，势不得全，乃与清帅约云：“从吾言，并力击贼，吾取北京归汝。不从吾言，等死耳，请决一战。”（多尔袞）问所欲？曰：“毋伤百姓，毋犯陵寝。访东宫及二王所在，立之南京，黄河为界，通南北好。”清帅许之，攥刀说誓，而以兵若干，助桂击贼。此记与《山海关大战》所云：“你我合兵击败闯贼之后，欲访到本朝皇太子，立于南京。本朝据河南，大清占河北，以黄河为界，永结盟好。”多尔袞说：“就依伯爷所言，日后灭了闯贼，贵我两朝，以黄河为界。现在军情紧急，你我各执刀剑，对天盟誓。”的记载是相吻合的。山海关大战后，吴三桂追击李自成，索要太子和二王，并向京城发出迎立东宫的通知，多尔袞首肯同意，进京后，并无南下之意，一度声明南北“通和讲好，不负本朝，彼怀继绝之恩，以惇睦邻之谊。”后降清曾请封地齐鲁，“且悉用旧人”。齐鲁（山东），正当南北之间，

与之黄河为界亦相吻合。在吴三桂举兵反清，特给康熙上书，指责多尔袞“顿背前盟”，“贪心无厌，驱兵南入，以致灭我社稷”。在讨清的檄文第二段中公开声讨多尔袞“逆天背盟，乘我内虚，雄据燕都，窃我先朝神器，变我中国冠裳，方知拒虎进狼之非，莫挽抱薪救火之误。”清朝对“背盟”一事不予正面反驳，避而不答。以至连《檄文》，清廷官方也只说三桂“伪檄”四处传布，其内容却不及一字。等等这些都充分的证明“盟约”确真，并非虚言。

自清太宗、世祖、多尔袞和康熙继位后多次许下的诺言，并注入金册的盟约：如“世世子孙，长享福贵，如山河之永也。”“大功茂著，宜膺廷世之赏，永坚带砺之盟。”“王其巩固封疆，殫抒筹策……功名永垂山河”。要三藩镇守南疆，“屏藩王室”，即“永不撤藩，子子孙孙世袭王爵，与清朝相始终。”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十月十三日，封平西王，颁发金册；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九月八日，顺治帝重封三桂为平西王，颁发金册的册文，其前半部是抄录原册内容，接着是历数三桂镇汉中的三年功绩，后为封赏爵位和诺言，并颁发金印。同一天发布出征四川的“敕谕”，给予奖惩，生杀“听王便宜从事”“地方既定之后，凡军机事务，悉听王调度”“文武各官有事见王，俱照王礼谒见”。

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6月，世祖册封三桂妻张氏为福金。册文：“勋高平翰，爰推懋赏之规，化起闺帷，聿重从夫之秩，丝纶特贲，祔翟增辉。咨尔平西王福金张氏，性秉柔嘉，心怀淑慎，相夫报国，殫翼戴之忠忱，砥德宜家，表温恭之懿范，是用封尔为福金，锡之金册，延兹世庆，益著誉于藩封，锡尔纯禧，永垂声于彤管，恩绵勿斁，贵极毋骄。钦哉！”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3月23日，世祖决定，“命吴三桂驻镇云南”。并云：“今思该藩忠勤素著，练达有为，足胜此任。”10月22日，世祖下达旨令，授三桂全权治理云南。十一月初一日，世祖和吏、兵部把云南的人事权、民政、军事、钱粮及一切事务，包括对地方的兴利除弊，实施各项措施等所有权，以至任免文武官吏权都授给三桂掌管。

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5月11日，玄烨亲自提名，给三桂晋封亲王指示四辅臣：

“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秦、蜀，绥辑滇、黔，抚顺剿逆，茂著勋劳。伪永历朱由榔，以明室遗孽，煽集党羽，妄称尊号，窃据一隅，历年以来，屡烦王师征剿，疆圉弗宁。今王奉命统领满汉大兵，出边进讨，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内进抵缅甸，擒伪永历及其眷属，又降伪巩昌王白文选，并伪官全军。此皆王殫忠奋力，运筹谋略，调动有方，遂使国威远播，逆孽荡平，功莫大焉。宜加殊礼，以示眷酬，著晋封亲王，应行事宜，尔部察例具奏。”6月30日，康熙玄烨正式向三桂颁发晋封亲王的金册、金宝。在册印中明载：“联登大宝，特仿古制，视诸臣功德差等，授以册印，俾荣及前人，福流后嗣。”12月，康熙又将贵州交由三桂全权管理。他指令吏、兵部“贵州接址云南，皆系岩疆要地，且苗蛮杂居，与云



南无二，其一切文武官员，兵民各项事务，俱照云南例，著平西王管理。”

吴三桂本无起事之心，只因康熙把他几代人所许下的诺言，通通撕得粉碎，以“必反论”而逼迫撤藩。使“全藩震动，人心沸扬”，由不满，顾影自怜，其属下被满族的压抑感油然而生，直至对清朝厌恶，痛恨，一种复仇的怒火在全军上下，已成燎原之势。故纷纷向吴三桂进言，如效法汉高祖“分羹之计”，引颈自戮，不如举兵。三桂一时难决；既忠保权已无可能，撤至辽东终究是死，可长子长孙还在北京，三桂泣之不已。女婿胡国柱建议，密使北京接回子孙（因应熊无意南下，只密领世璠回云南）。至此，吴三桂权衡利弊，又与方光深谋划，认为闽、粤、鄂、冀、黔、川，可传檄而定，其余易攻，胜券在握。由此在毫无退路选择的情况下，不得已再举反旗，与清决一死战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九月七日，使臣折尔肯一行抵达昆明东的归化寺，数以千计的庄民们请命，求留三桂于云南。折尔肯一不作解释，二不劝说，而以杖势怒责庄民并下令逮捕为首的数人，甚至威胁：“谁敢说留者斩！”至昆明，吴三桂拜受诏令，表面上侍奉接待，遣心腹款护二使，检点库款，整顿箱笼，佯以交御之姿，释使臣之疑，以延缓待机。暗中抓紧筹划，决定就地起兵，以固根本。同时采取果断措施，派遣心腹守将封锁关口，许进不许出。并密请匠工铸印，名号为：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。”由于同知刘昆侦知，上书被巡兵所得，故加快了起兵准备。十一月二十一日借祭奠永利之时杀了催促之吏、巡抚，逮捕钦差，正式宣布起兵。树起了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吴”11个大字的旗帜，1674年正月，正式宣布建元，年号周启。

（四）反清战争起 八年大周亡

“大旗一举，四方响应”。《中国通史》第九册《反清战争的发展》写道：“吴三桂起兵后，即传檄各地，与汉族军将相联络。各地区的汉族将官，多是明朝旧臣，他们降清后，和清朝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。四大臣辅政时期，鳌拜等排抑汉官打击文士的措施，必然要引起武官的不安，矛盾的激化并不限于藩王。吴三桂的发难，成为一个导火线。各地汉人官员将领，纷纷起兵响应。吴三桂的割据之战，迅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清战争。”

自1673年11月21日起：赶撰檄文，印送檄文，联络各方，组织军队，选将命职。设金吾前后左右四将军由胡国柱、夏国相、吴国贵、吴应期担任；设左右两翼下设左右两掖将军，铁骑前后左右将军，骁骑前后左右将军，分别由马保、王屏藩、卫朴、陶继志、张足法、王会、高启隆、线维明、田进学、范齐韩、廖进中等担任；方光深、来度、钱点、韩大任、冯苏、吕忝子等为吏，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土六曹（即六部）；郭昌为云南巡抚；郭壮图为留守云南路总管，料理核查云南府属印信，催征银两保证军饷的供给。同年12

月1日,吴三桂自云南挥师北伐,向清朝展开了战略进攻。贵州李本深首先响应,巡抚曹中吉、总兵官王永清归附,十二月贵州一定,次年正月,王屏藩进军四川,巡抚罗森,提督郑蛟麟,总兵官吴之茂、谭宏等积极响应,起兵反清。大西南三省不战而统一于三桂麾下。

吴三桂起兵后仅一年多,已发展到云贵川桂台全部,不久又有闽、秦、甘、湘的大部,鄂、赣、浙、粤、冀、豫的一部分,以至京师共达17个省市,其波及不断延长延深,四面八方燃起反清战争的烈火(除广东尚可喜上书效忠清朝封亲王外),其来势、规模都是空前的。这场反清战争,不仅是吴与康熙之争,而是汉族同满族统治者的大较量(实质上是一次民族争战)。参加这次战争的汉官汉将占26人,各省布政使以下的文职523人,参与战争的汉民更是难以数计,如埔圻一带百姓俱行蓄发参加抗清,江西、浙江等人民反清于建昌、饶州等地,自觉抗击“满州官兵”,各省凡反清军所到之处,皆有大量的汉人百姓参加,所以说这场战争是场反对清朝排、抑、压汉的民族之间的大内战。

本来反清战争的发展,形势是有利的,如果乘胜进军,借着各地起兵反清的大势,乘清朝无备,军力未集,清统治集团惊慌失措之际,一鼓作气,挥戈渡江,北涉黄河,直逼北京,可以大获全胜。可是吴三桂在战略战术上却犯了两个致命的大错误,导致形势逆转,反清失败的悲剧。

(1) 没有把握有利时机,及时组织,统一部署,指挥全局,协同作战,建立一个有领导、有组织的反清战争的指挥中心,而诸多起兵将官长期处于各自起兵各自为战,缺乏明确战略目标的局面,给清朝造成有利各个击破的战机。

(2) 不听忠告,犹豫不前。谋士刘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,直捣“黄龙府”;还有人提出,“下九江,扼长江、淮河,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;吴国贵、夏国相等见三桂无意北上,力劝进兵四川,占据关中,与清朝争夺中原等等主张战略进攻的意见,吴三桂皆不听取,进至长江南岸,即停止进兵;一至湖南,而屯兵不前,坐失良机。

吴三桂“欲出万全,不肯弃滇、黔根本”的想法,该进不进,举足可渡江而不渡江的战略失误,给清朝创造了转败为胜的良机。

由于机一失而导致陕甘战场,王辅臣被迫降清;浙赣闽战场,耿精忠降清,郑经战败;广西战场,桂林守将被杀害,余者降清;广东战场尚之信降清。纵观其势,吴三桂日趋限于孤立之中。就是他之主战场,康熙已调兵20余万对付三桂。吴三桂除云贵川外,仅有20万兵力。吴应期率7万兵防守岳州,城内外构筑防御工事,在洞庭湖峡口处攒立梢桩,同时在澧州、石首、华容、松滋等地派驻重兵,与岳州成为犄角之势;并令“贼将坚守,且趣进兵”;又以7万兵力,总兵10余人,“猱猱”兵3000驻醴陵、长沙、萍乡等处,抗拒江西清兵。同时,又驱使云贵土司苗、壮土兵来湘助战,组成一支有四、五十只大象的象阵,所以清军两年多未获一寸土地。